

张新科 赓续红色文学血脉

文 张一然

运河支队是铁道游击队的兄弟部队,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苏鲁交界、运河两岸。陈毅元帅曾盛赞“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”,罗荣桓元帅也曾称这是一支“能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”。长期以来,运河支队的故事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文学展现,所以未能像铁道游击队那样家喻户晓。为了弥补这一遗憾,知名作家张新科历时十余年,广泛搜集素材,精心创作了6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大河》,将运河支队尘封几十年的峥嵘往事展现在读者面前。由于当年运河支队多次与铁道游击队并肩作战,因此《大河》也被评论家称为“大运河畔的(铁道游击队)”。

运河支队自发抗日 绝不是为了升官发财

徐州是苏鲁两省交界。抗日战争时期,活跃在这一带的铁道游击队人数最多时有300余人。作家刘知侠以其为原型创作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,1956年被搬上银幕,电影插曲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广为传唱,让这支队伍成为传奇。与铁道游击队同时期,同地区还有一支民间武装力量——运河支队,实际上战斗力更强,共有3000余名战士,长期与日寇浴血奋战。

“《大河》的创作,源自我与运河支队后人的相逢。”张新科曾在徐州某高校任职,偶然接触到运河支队的后代,听他们讲述自己爷爷奶奶的故事。“他们讲的时候,那种诚挚的情感、那种无以名状的哀伤,真的让人动容。记得有一位后人说,他的爷爷奶奶都是为革命献身的,是不得了的革命英雄,他很羡慕铁道游击队的后人,因为那些故事家喻户晓,而运河支队的故事却没人去写。他很想让人们知道自己爷爷奶奶的故事。”

看着那一一张张充满遗憾的面孔,张新科萌生了一个念头——挖掘这支英雄部队的革命故事。“运河支队的后代对先辈的革命事迹念念不忘,这让我觉得,这份情感实在是值得去记录、去抒写。”之后的十余年里,他拜访运河支队成员的后人,实地走访铜山、贾汪、柳泉、利国、邳州、睢宁、张山子、微山湖、黄邱山套等运河支队当年战斗过的地方,搜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。

张新科说:“写作之前,必须先把历史背景、真实事件了解透彻。特别是有些主要人物,他的成长过程、心路历程乃至他最后的牺牲,将这些贯穿下来,呈现出来,会让我们的精神受到洗礼。爱国、正直、奉献……这些东西会因时光流逝而改变。”

通过深入探访,张新科了解到,抗战初期的民间武装力量多数都是自发的,是亲戚拉亲戚,朋友拉朋友,这种聚合不是为了升官发财,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,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。”这个出发点特别悲壮。”他说,运河支队不仅仅是某个人、某支队伍,而是代表了我国国家民族的一种精神,一种信仰。“这种精神和信仰,过去是这样,现在也是这样。环境变了,但它的意义没有改变,肯定会对每个人都产生影响。”

运河支队令人感动的故事真的太多了。



张新科

1966年出生,河南上蔡人,现居南京。小说代表作有《远东来信》《铄羽》《山河传》《苍茫大地》《鏖战》《渡江》等。曾获《小说选刊》年度短篇小说奖。

比如,新四军、八路军的干部到延安开会,经常会由这支队伍担负沿途护送任务。有一年冬天,陈毅老总去延安,运河支队派出精壮战士护送首长。陆路骑马,水路坐船,马也要上船,因为过了河还要骑马。但是马怕水,不肯上船。怎么办呢?运河支队的小伙子没有任何顾虑,直接下河入水,使劲儿把马拉上船。河水冰冷刺骨,人在河里都快冻僵了。除了道路难行,更有敌人的围追堵截。面对敌人的一次次袭击,战士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顶住,甚至有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张新科深受感动:“别看运河支队不是正规军队,只是民间武装力量,但战士们组织性、纪律性很强,接到命令就会毫不犹豫地执行。那种舍生忘死的精神不正是支撑我们民族站起来的力量吗?‘位卑未敢忘忧国,事定犹须待阖棺’,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,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力量!越是看似平凡的事,蕴含的大道理就越多,越客观,越有力量。小人物也有大情怀,我相信对今天这个时代是有很强的感染力的。”

真实还原历史 再现运河支队传奇

徐州市贾汪区水利局有一位姓贾的干部,听说张新科计划创作运河支队题材的小说,内心特别激动,给他打来很多次电话,讲述自己的爷爷奶奶、大爷爷大奶奶、二爷爷二奶奶当年的故事。张新科说:“他们全家男男女女14口人参加过运河支队,其中很多人牺牲了。他每次跟人提起运河支队,对方总是一脸茫然,没听说过这支队伍。这让他觉得很憋屈,拜托我一定要将先辈的故事写到小说里,希望世人

能够知道,能够传承下去。那个年代的人生活条件那么艰苦,他们还会抛家舍业、挺身而出,为国家献身,为民族战斗,这是多么伟大的英雄情结啊!”

在这些素材的基础上,张新科写就《大河》一书,告慰长眠地下的运河支队数千位英灵。小说的主人公叫胡轩涛,原型是运河支队的胡大贵。胡家是大富之家,但他为了抗日主动变卖家产,把钱财都用于招兵买马,购买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。他几乎把所有的家产全都投到运河支队上,没给自己留任何退路。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动荡,对普通老百姓来说,家里有一点钱财,就能多一份安全感,但胡大贵真的是为了抗日抛家舍业。细读此书我们会发现,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特别让人敬佩——他们干的是掉脑袋的革命事业,日本鬼子来了,他们争先恐后地去迎击、搏杀,是真正的血性男儿。时代塑造了运河支队,他们也创造了时代,终将成为传奇。

创作《大河》,张新科想从宏观上表达三重心愿:“一是对于滚滚向前的历史过程而言,希望这部小说能解读我们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精神密码;二是对于运河支队而言,这部小说弥补了他们曾缺席于历史记忆的遗憾;三是对于大运河文化而言,这部小说揭示了大运河精神蕴含的红色血脉。”他表示,希望读者读完这部作品之后能够产生一种底气、一种自信,继续传承我们的民族精神。

文学评论家何平认为:“张新科的写作丰富了中国革命史文学的序列,对于保存地方革命历史,构建人们的集体记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”

在创作《大河》之前,张新科已经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,其代表作“英雄传奇三部曲”(《苍茫大地》《鏖战》《渡江》)分别弘扬了雨花英烈精神、淮海战役精神、渡江战役精神,出版后产生持续影响,常销不衰。“我偏重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,写这样一本书大概要两年时间,但是前期调研需要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,这还不算平时的日积月累。文学创作要求脑力、笔力、体力三位一体,哪一个阶段跨不过去,都无法走到下一步,对创作者真的是一种考验。”

张新科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感悟颇深,并将其总结为“返回历史,再现历史,传承历史”。所谓返回历史,就是通过实地探访、查阅县志乡志、回忆录、口述史等资料,把自己带入那个年代。他说:“那个年代的人,他说话的语调和习惯、他的一举一动、他为人处世的方式都和今天的人不一样。写作者不能凭空幻想,更不能主观臆断,把现代人的逻辑与思维强加给那时候的人,所以首先要尽可能真实地返回历史。”然后是整理资料,创作作品,再现历史。最后,当读者通过阅读有所收获时,就会起到传承历史的作用。“用讲课、写论文等方式传递历史可能收效甚微,因为大众更愿意阅读饱含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。我们通过一个个故事串联起国家历史,更容易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。”

与文学结缘始于幼年 致力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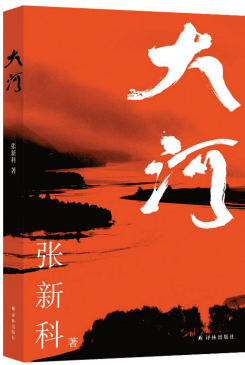
张新科与文学结缘始于幼年。他的父亲是省重点中学校长,这所学校考到外地的学生很多,经常有学生回来,到他家做客。家里成了一个“小舞台”,人来人往,你说一个故事,他讲一段经历,不仅热闹,而且信息量颇丰。张新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,跟同龄人相比,对社会的了解、感悟,对人生的展望、憧憬,以及日常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更加成熟。

1984年,张新科考入南京一所高校,读化学工程专业。虽然学的是理工科,但业余时间他更喜欢看电影,读小说、参加诗歌朗诵会,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。上世纪90年代,他被公派留学德国攻读博士。在求学的同时,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游览欧洲名胜古迹、人文地标,包括一战、二战遗址,不仅开阔了眼界,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。

当今社会飞速发展,文学逐渐被边缘化,但张新科仍愿意花费大量时间、精力去搜集素材、创作小说。他说:“我曾是教育工作者,对年轻人有很深的了解,他们通过书籍、电影、漫画等获取文化信息,但这些作品能真正反映真实历史、宏大事件的并不太多。任何年代都不能没有严肃文学,因为总要有将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,留给后人。另外,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往往涉及面广、人物多,对素材的要求比较高,创作难度大,所以可能会让一些作家望而却步,但我觉得这是时代赋予我的任务,我应该去努力完成它。”

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,张新科经常关闭微信、减少社交活动,节省一切能节省的时间,每天晚上写3000字,这个习惯保持了十余年。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整体规划:中短篇小说写当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;长篇小说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。他遵循八个字: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。有非常详细的材料和考察做支撑,文学的虚构变成了历史的真实,这正是文学应该具有的气质。

虽然每一部作品的完成过程都十分艰难,但对张新科来说,也收获了独特的快乐。“比如,我的很多小说是畅销书,销量还不错,在音频分享平台的播放量也比较高。每次想到有那么多读者在读、在听,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,所以哪怕挣不到钱,我也愿意搞创作,把我感受到的那些伟大的精神传递出去。”



张新科长篇小说《大河》

讲述

徐则臣读经典:我们为什么爱读汪曾祺?

他如实写出了对生活的感觉

口述 徐则臣 整理 何玉新

近日,“徐则臣:我们为什么爱读汪曾祺?”名家读经典文学活动在北京老舍剧场举行。这是“第八届北京十月文学月”活动之一,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、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主办,同时进行了线上直播分享。汪曾祺的作品受中国士大夫精神和老庄哲学的影响极大,他的《受戒》是当代文学经典作品。文学滔滔,文脉悠悠。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和汪曾祺一样,小时候都生活在大运河边上,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身上都有着水乡韵味。徐则臣系统地研究了汪曾祺其人其作,现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。

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 都是在他60岁前后写的

我是汪曾祺先生作品的爱好者,是他的“粉丝”。汪先生是非常复杂的作家,虽然他的作品相对比较明丽、比较晓畅,比较平易,给人感觉很容易把握,但我们错了。他的作品、他的写作背后的资源都非常复杂。

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写过一个短篇小说,自己不是很满意,稿子也没了。到他五十七八岁时,又把

这个小说重写了一遍,就是《异秉》。然后他又写了《四十三年前的梦》,写自己十七八岁时在寺院里的一段经历。之后写《受戒》《大淦记事》《岁寒三友》等。作家其实就是这样,到了一个合适的阶段,同类作品全都出来了。故事发生地是一座特别小的寺庙,只有几间屋,三四个和尚。当年他们有土地可以租出去,小英子的父母来租种寺庙的土地。男孩明海家女孩的形象特别美好,所以也想写出这样的人物。小英子确有其人。很多年前汪曾祺在寺庙里居住,见过这样一个女孩。重读沈从文的作品,唤醒了他的记忆。

《受戒》一万多字,读起来特别轻松,会沉浸下去,有一种美好的、诗意的、放松的感觉,不知不觉就读完了。故事发生地是一座特别小的寺庙,只有几间屋,三四个和尚。当年他们有土地可以租出去,小英子的父母来租种寺庙的土地。男孩明海家女孩的形象特别美好,所以也想写出这样的人物。小英子确有其人。很多年前汪曾祺在寺庙里居住,见过这样一个女孩。重读沈从文的作品,唤醒了他的记忆。

之所以会写这个小说,是因为那段时间老师沈从文要出版文集,作为学生,汪曾祺把老师的作品重新读了一遍,再次感受到《边城》《长河》等小说里面三三、天天、翠翠这些年轻女孩的形象特别美好,所以也想写出这样的人物。小英子确有其人。很多年前汪曾祺在寺庙里居住,见过这样一个女孩。重读沈从文的作品,唤醒了他的记忆。

汪曾祺说过,还是要写,而且要



徐则臣在活动现场

写得很美、很健康、很有诗意。我觉得这三个词正是我们认识汪曾祺的关键词。所以《受戒》中小英子和明海才会是那种天真烂漫的状态。他的作品最大的价值就是还原生活本身、体贴生活本身、认同生活本身。他说:“我如实地写出了我对生活的感觉。”他认为,小说就是跟一个能谈得来的朋友谈一点你所有知道的生活,就是两个人聊天,很随性。这是他对小说的认知,没有把它刻意拔高,没有把它变得传奇化,也不会把自己的小说变成生活的对立面、对手或者敌人。

现在很多影视作品或舞台剧的台词,就算认真地去理解,也不一定看得明白,但汪曾祺写的对话非常简单,看一遍就能记住。我觉得这就是作品跟生活之间的关系——无论情节还是细

节,都源于生活。在他的笔下,人的生活、人情世故是美丽的、诗意的、恬淡的,无论乐悲,是否阴晴圆缺,人们都挚爱着生活,也都拥抱着风俗,在风俗中逗趣,于生活中洒脱。

他不屑于编故事 只想呈现生活本身

梳理汪曾祺的作品,我发现像是进入了一座巨大的迷宫。他的小说、散文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有点儿飘逸、有点儿人世,又有点儿出世的感觉,可以看出老庄的、士大夫的中国传统对他影响比较大。对他产生影响的还有现代主义。他对文学的思考、对时代的思考也很深入。

上世纪80年代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高峰期。这个时期文坛风起云涌,多数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坚硬、冷酷,莫言、苏童的小说则是将现代生活传奇化。而汪曾祺一直按照自己的路子走,他说,我不太会编故事,也不屑于去编故事,只想呈现出生活本身的状态。他不喜欢在小说中营造一种非常机巧的、奇绝的、刁钻的结构,而是倾向于契诃夫的小说风格,就是那种风行水上,随处成文,非常自然的状态,所以他的小说成了散文化写作的典范——故事性不强,语言呈现出散文的特点。

汪曾祺评价自己的小说: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,而是和谐。”我觉得,沈从文的小说犹如大地上的行吟诗人,有一种悲伤的、惆怅的,稍微有点儿苦寒的感觉;汪曾祺的小说则像年画,是过年时特别喜庆的、饱满的、欢乐的感觉,但又不是那种大欢乐。

汪曾祺的小说更适合去感受,而不是解读。他不喜欢严格的布局结

构,主张信马由缰,写到哪儿算哪儿。他会在开头大段大段地介绍这个地方,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代清楚了,然后讲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。哪怕他什么都没说过,就在这散淡地讲这条街是什么样,那条巷子是什么样,也依然有味道,因为文字背后的阅历、修为在起作用。

汪曾祺在自述中说:“我只写短篇,因为我只会写短篇,或者说,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。”他的小说最长的就是《大淦记事》,不到两万字。有人问能不能把它再拉长点儿,变成中篇小说?汪曾祺一口拒绝,说它就是它该有的样子,如果拉长了就不是现在这个小说了。他认为短篇就是短篇,不存在可以作为长篇的短篇,也不存在可以作为短篇的长篇。

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作家 他的小说所有元素都是中国式的

汪曾祺是高邮人,里下河地区。大家都知道高邮鸭蛋,一个重要的代言人就是汪曾祺,他在作品里屡次提到高邮鸭蛋。我写《北上》的时候经常读汪先生的作品,因为要找到大运河水汽氤氲、波涛浩渺、蒹葭苍苍的感觉,同时也找到人情冷暖的感觉。

汪曾祺有一个观点,他觉得文学有三种作用:教育作用、美感作用、认识作用。他更强调美感作用,就是我们所谓的美育。很多人觉得美是一种外在的、感觉化的东西,并不深刻。比如我们会认为加缪、萨特是有思想的作家,鲁迅是有思想的作家,但很少说从文、汪曾祺是有思想的作家。其实这个问题作家曹文轩给出了答案:“美也是一种思想,因为它可以改变你的内心。”

我们现在回头看汪曾祺的作品,会看到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作家。他

对话张新科

如果真的热爱什么 就会自发地找寻出路

问:您学的专业是理工科,却在文学创作上开花结果,理智与感情并存,这种思维特质是如何形成的?

张新科:我是1984年上大学的。那个年代有一句流行语: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。”无论学校还是家庭,都比较重视理科。我父亲是省重点中学的校长,学中文出身,特别喜欢聊文学,这一点儿女的影响很大。我本来想学文科,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理工科。现在回头想想,我们其实不能以对错高低来论文理科。上大学以后,我对文学的喜爱没有变。有时刚刚做完化学实验,就跑到图书馆去阅读文学作品;有时刚考完化学,晚上就去听文学讲座。所以,如果一个人真的热爱什么,是可以自发地找寻出路,来壮大内心的那种热爱。上学期间我开始写一些散文、小小说,一直坚持下来。

学理工科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帮助,因为在创作中,可以靠技术本身进行推导。比如我写谍战小说,写到一种药品,会根据药的颜色推断含有哪些有机物;刺杀现场留下油污,我可以分析它是溶解于水的机油还是汽油、煤油或柴油。我利用理科特长来解构,用技术思维去贯穿,情节、逻辑就更好玩儿了。

问:留学海外的经历给您的思维和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?

张新科: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德国留学的。记得那时德国马克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:5,德国的大学教授月薪1万马克。我的博士生导师和我聊天,问我在中国月薪多少钱,并解释说不是要打听隐私,而是想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。那时我在国内的收入不到100块钱人民币,可想而知差距有多大。我去欧洲各国旅行,提前自己烙饼、煮茶叶蛋,还得自己带水,因为买水太贵了。不光是我,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想去旅行都会自备吃喝。到现在30年过去,中国经济的发展真的令人震撼。

留学使我在东方式思维的基础上熟悉了西方式思维,遇到问题时,既可以用东方式思维去思考,也可以用西方式思维去解读,相当于多了一个看待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角度与办法。总体来说,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能够多元化,那么他观察问题的视角就会更开阔。有时候遇到事情想不通,可能换了一种思维就想通了,整个人生也会淡定一些了。另外,了解不同国家的历史、文化、思维方式,其实相当于延长了我们人生的长度,增加了生活的厚度。

问:接下来您的创作计划是什么?

张新科:我自觉还有一定的文学任务,我想创作一部抗战时期国际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,因为这方面我可能有些优势,比如了解外国人的语言、文化和思维习惯。另外我还在筹备一部描写中国两代留学生故事的小说。上一辈在抗战时期出国留学,下一代是当下的年轻人去留学,其中发生了很多折射时代变迁的故事。比如说两代人之间的矛盾,母亲教女儿留学时要注意什么,但女儿并不是很乐于接受。这个对比非常有意思,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